

李富强 著

乡土寻

梦

中国现代乡土思想与实践



人民 出 版 社

乡土寻梦

中国现代乡土思想与实践

李富强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版式设计:程凤琴
封面设计:王芳芳
责任校对:张春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土寻梦——中国现代乡土思想与实践/李富强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9
ISBN 978-7-01-009222-5

I. ①乡… II. ①李… III. 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1365 号

乡土寻梦

XIANGTU XUNMENG

——中国现代乡土思想与实践

李富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25

字数:193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222-5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内 容 提 要

自近代以来,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工业文明而危机重重,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无不从“乡村”、“乡土”中认识中国,思考着中国的出路,不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是改良者,还是革命家,都从“乡村”、“乡土”出发探索古老中国的重生、复兴之路。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在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历尽坎坷,百折不挠。虽然工业化、都市化程度有了一定提高,但中国依然是农业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农民国家;尽管农村收入有相当程度的提高,但城乡差距越拉越大;虽然农村中一部分农户富裕了起来,但贫困户亦比比皆是;虽然一些地区的村社经济有所发展,但一些地方村社经济衰退,农业凋落,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源源不断涌入城市,农村生活冷落,文化萧条;一些地方农民与基层政府关系紧张,一些地方甚至黑恶势力泛滥成灾。于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响起,“乡土”重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先贤志士的乡土思想与实践探索已在中国近代史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现如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乡土”的探索依然继续。本书试图通过梳理总结中国百年来的“乡土”思想及其实践,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借鉴。

目 录

绪论 乡土:中华民族复兴寻梦之所	1
第一章 社会调查派	9
一、陶孟和:从调查改革社会	11
二、李景汉:根据调查解决社会问题	13
第二章 平民文化派	19
一、民俗学	25
二、民间文学	30
三、新史学	38
第三章 乡村建设派	48
一、定县平民教育模式	51
二、邹平文化复兴模式	60
三、北碚实业民生模式	69
第四章 社区研究派	79
一、社区研究派的形成与初步实践	82
二、社区研究派的挫折与反思	107
三、社区研究派的复兴	114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者的初步探索	135
一、“中国农村派”的理论探索	136

绪论 乡土：中华民族复兴寻梦之所

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

——李大钊^①

中国社会一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

——梁漱溟^②

乡村只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部分，我从这部分的认识中得来的看法自不免亦有所偏。……我决不敢说乡村之外的中国是不重要的，更不敢相信乡村可以和其他部分隔绝了去解决它的问题。我只能说在乡村里可以看到中国大部分人民的生活，一切问题都牵连到这些在乡村里住的人民。我也相信目前生活最苦的是住在乡村里的人民，所以对对他们生活的认识应当是讨论中国改革和重建的重要前提。

——费孝通^③

①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见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一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第93页。

② 梁漱溟：《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见许纪霖编选：《内圣外王之境——梁漱溟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③ 费孝通：《乡土重建》，见《民国丛书》第三编（14），上海：上海书店，1948年，第152页。

有一个梦想,属于所有中国人,这就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百年梦想,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而这个梦想从乡土出发,一直萦绕在乡土之上。

自近代以来,当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工业文明而危机重重,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无不从“乡村”、“乡土”中认识中国,思考着中国的出路,不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是改良者,还是革命家,都从“乡村”、“乡土”出发探索古老中国的重生、复兴之路。

“乡土”是在中国农业社会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比较中凸显的。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指出:“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个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有势者的家庭。”^①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曾几何时,中国城市和市镇的繁华让“野蛮的”西方人惊慕不已。打开13世纪末年问世的《马可·波罗游记》可以发现,足迹遍及中国西北、华北、西南、华东的马可·波罗,在书中以大量的篇幅、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有学者认为:“大体说来,西方世界形成比较明确的中国形象,约从13世纪中后期《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马可·波罗游记》等的出版和流行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神秘而富庶的东方国度。而17世纪末和18世纪,沉醉在‘中国文化热’氛围下的欧洲人,更是视中国为政治开明、教化理性、文明高超的效法榜样。”^②美国学者M. G. 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在《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一书中指出,16世纪后期,当传教士和其他旅行者离开故土前往东方的时候,他们的

①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② 黄兴涛、杨念群:《“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总序》,见[美]E. A. Ross:《变化中的中国人》,公茂虹、张皓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页。

身后是一个被宗教和政治纷争弄得四分五裂的欧洲。与西方的这些情况相反,中国的安宁和繁荣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6世纪直至18世纪后叶,强大的中国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难怪耶稣会传教士高度赞扬了中国文明的许多特征。^①英国学者约·罗伯茨(J. A. G. Roberts)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也说:“十八世纪时,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那些以耶稣会士的报告作为自己观点基础的启蒙思想家们在这方面堪称独步。伏尔泰曾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誉为‘人类精神所能够设想出的最良好的政府’。他们对据说在中国存在的宗教宽容推崇备至,他们还特别赞美中国的手制品,尤其是陶瓷。所有这些在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兴起的‘中国时尚’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②然而,也就在18世纪后期,中国开始进入停滞和倒退,而西方通过工业革命,走上了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特别是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相形于以工业化、都市化为特征的西方文明的生机勃勃、蒸蒸日上,中国落后的农业,分散、贫穷、凋敝的乡村较之以往更引人注目。于是,中华帝国的富庶、繁华的城市淡出了西方人的视野,乡村主宰了中国的形象,西方—中国乃“都市—乡村”的印象模式便于潜移默化间在西方建构了起来。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 H. Smith)是反映西方中国观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人物。1899年,他出版了《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以自己在中国农村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农村敏锐的观察,对中国农村进行了精彩、生动的描述,虽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但却是西方中国观转变的一部标志性著作。中国既已成为了“乡村”,那么把握了乡村自然就把握了中华文明。所以,明恩浦在该书中说:

^① [美]M. G. 马森:《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 1840—1876》,杨德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09—312页。

^② [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页。

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通过对它的考察,我们将会更好地提出纠错改正的建议。我们不能过于重申中国在统一性上的多样性,因为这种断言总是暗含着这样一种局限:尽管多数情况并非如此,但在某处确乎真实;另一方面,多样性的统一性是中国一种真正典型的事实,尽管这种情况是有限的,但并非不值得我们重视。^①

他在另一部以中国乡村生活为素材写成的著作《中国人德行》中,更明确地指出:

就像在农村比在城市更易于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图一样,在家庭中更易于了解人的德行。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城市住上十年,所获得的关于人民内部生活的知识,或许还不如在中国村庄住上十二个月得到的多。仅次于家庭,我们必须把村庄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②

在西方学者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的“乡土性”也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开篇即说: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殊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③

梁漱溟也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村落社会。所谓村落社会,非如欧洲

① [美]明恩浦:《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② [美]明恩浦:《中国人德行》,张梦阳、王丽娟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

国家社会有村落，而是村落即社会。所以，“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①

如果说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关注乡村中国，是由于西方学者在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农业文明的冲突中，建立起来的以西方为都市中心、以中国为乡野的思维模式，那么，中国本土学人对中国社会的“乡土关怀”，则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农业社会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出现的危机，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乡村问题，为“救亡图存”，实现“富民强国”的理想，而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学术追求与乡村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力图从传统中国社会出发，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他们研究乡村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而代表了中国一代有识之士的历史使命和抱负。费孝通下面一段话颇能反映当时一些学者的使命感：

即使我承认传统社会曾经给予若干人生活的幸福或乐趣，我也决不愿意对这传统有丝毫的留恋。不论是好是坏，这传统的局面已经走了，去了。最主要的理由是处境已变。在一个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洋的旁边，决没有保持匮乏经济在东方的可能。适应于匮乏经济的一套生活方式，维持这套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是不能再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新的处境里了。“悠然见南山”的情境尽管高，尽管可以娱人性灵，但是逼人而来的新处境里已找不到无邪的东篱了。我不反对我们能置身当年情景欣赏传统的幽美，但这欣赏并不应挡住我们正视现实：这一个利用自然动力，机器，和庞大组织的生产方法；这人口汇集，车如流水的都市；这财富累积，无厌求得的社会；这疾如流星，四通八达的交通；这已经发现了利用原子能的新世界。^②

^① 梁漱溟：《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见许纪霖编选：《内圣外王之境——梁漱溟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② 费孝通：《乡土重建》，见《民国丛书》第三编（14），上海：上海书店，1948年，第9—10页。

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现代‘乡土’迷恋的现象:

对于“家乡”或“乡土”的现代迷恋是有关地方(the local)或区域(the regional,汉语中称为乡土、地方)的现代表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前半叶,“地方”被普遍(尽管并不仅仅被)表征为一个更大的形成物——如民族或文化——之真实价值观念(authentic values)的地点,这种真实价值观念尤其在乡土当中得到具体体现。由于资本主义、现代以及都市的价值观念势力日隆,并对地方构成威胁,这种将地方表征为真实的做法常常被人们所夸大。同时,民族主义也需要一个具有真实性的领域。它力图对这一领域加以保护,使其免受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和均化性力量(corrosive and homogenizing-forces)的影响。有关真实性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超出了地方的范围之外——弥漫于关于现代的全球性的话语当中,代表着大致在20世纪前80年间,民族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划时代联系当中的中心张力领域。

随着地方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文化真实性的一个中心焦点,地方话语也出现在各种宣传媒体当中。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看到,地方话语以木版画、风景艺术、明信片或日历等视觉表现形式,在诸如人类学、民俗研究、地理学、地方史以及乡土文学这样的学科中,而且部分地在诸如乡土重建运动和毛主义的群众运动这样的政治实践中,被生产出来。^①

因而,中国近代学人的“乡土关怀”,不仅限于人类学、社会学,而滥觞于哲学、文学、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众多学科,不拘于理论研究,且贯穿着前赴后继的探索实践。它是广泛而深入的。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各有不同的分析切入点及关注的焦点,形成了各有差异的理论视野或概念

^① [美]杜赞奇:《地方世界:现代中国的乡土诗学与政治》,褚建芳译,王铭铭主编:《中国人人类学评论》第2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第21页。

框架,生成了不同的学派,各个派别的思潮又在交锋碰撞中磨砺、升华。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在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历尽坎坷,百折不挠^①。虽然工业化、都市化程度有了一定提高,但中国依然是农业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农民国家;尽管农村收入有相当程度的提高,但城乡差距越拉越大;虽然农村中一部分农户富裕了起来,但贫困户亦比比皆是;虽然一些地区的村社经济有所发展,但一些地方村社经济衰退,农业凋落,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源源不断涌入城市,农村生活冷落,文化萧条;一些地方农民与基层政府关系紧张,一些地方甚至黑恶势力泛滥成灾。凡此种种,令人忧心。言称“危机”固有人以为是言过其实,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②却是人民心底的呐喊,它警醒人们,乡村依然是中国现代化的瓶颈,“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性问题。于是,“乡土”的思考又重回人们心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对现实的回应,也是对历史使命的担当,它的提出和开展更使乡村成为政界、学界等社会各界关注与着力的重点和焦点。如果说乡土中国如何面对“现代”的挑战,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的話,这个问题也注定是新世纪知识分子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近20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乡村研究热”,实际上是对20世纪上半叶乡土中国研究的认同、回归、反思和拓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着共同使命的新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是相通的,我们完全可以而事实上也是在与前辈们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中,获得对乡土社会及其变迁的新认识。因此,对中国百年来的“乡土”思想及其实践进行回顾和研究,

^①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7页;温铁军:《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载《读书》2001年第3期,第3—11页。

^② 2000年3月,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赤诚之心和对农民的深切同情,直言上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高度重视,朱镕基等中央领导动情批复,由此在当地引发一场“痛苦而尖锐的改革”,“三农”问题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倍受社会各界关注。参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

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实践上的;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

英国人类学家谢林(Teodor Shanin)曾经说过:“知识——尤其是农村的知识——对社会的重大意义只有农村本身的复杂性与难以捉摸足以相比,知识有巨大的力量,可以影响人类而使之动员,能够制造变迁也能中止变迁。这一切可以使乡民社会研究者的生活感到刺激而有价值,甚至是具有突破性与革命性。”^①先贤志士的乡土思想与实践探索已在中国近代史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现如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乡土”的探索依然继续。我们期待着能通过梳理总结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成败得失,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参考借鉴作用。果若能如此,则幸莫大焉!因为中华民族复兴之梦依然继续着,乡土依然是魂牵梦绕之所在。

^① 谢林:《乡民经济的本质与逻辑》,见沃尔夫著:《乡民社会》,张恭启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3年,第204—205页。

第一章 社会调查派

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态,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惊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每每不顾国情,盲目地整个把西洋的各种主义和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以为只要学得惟妙惟肖,便是社会的福利。哪知道主义和制度介绍得越多,中国的社会,反倒越发絮乱越发黑暗了。于是一部分有识之士,看出这种只模仿他人而不认识自己的流弊,便起而提倡社会调查运动。主张用科学的精密的方法,研究我们自己的现实社会。我们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社会,然后才可以根据这认识规定改进社会的计划。这如同治病一样,必须先检查病源,然后才可以处方下药。

——陶孟和^①

吾国数千年来,书籍浩繁,而关于社会实况之抒述甚鲜。故吾人欲洞悉古昔社会一般之情形,民风物情之梗概,仅能于稗史杂记中见之,鳞爪断碎,欲自其中得一社会状况整个之印象,至难能也。第昔时农业自足之社会,人民耕而食,桑苎而衣,伐木艺竹而材,服先畴而习旧规变迁甚微。自东西沟通以来,西洋经济努力,渐渐侵入吾国,人民之经济生活,随之而产生变迁。而经济蜕变之时,新陈代谢之

^① 陶孟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陶序》,见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5页。

际,又易发生病态,影响人民生机。故在今日研究社会情况,较昔时重要远甚。加以近二十年来,内战频仍,匪祸滋蔓,人民困于诛求,几无宁岁,匪区农地荒废,生产没落,全国农民经济已达破产时期,整个社会亦极呈临危不安之象,民困已深,调查尤为急务。民国政府年来,怵目民艰,已屡有注意农村建设之计划,第思想必根于事实,建设必本于实况,病征不悉,治疗无从,故居尝谓调查社会实况,实为今后一切建设之根本要图。

——何廉^①

中国的社会调查概念体系源于西方,尽管在实学思想的刺激下,中国自古即有社会调查之行为^②,但是作为行政管理、军事行动及某些经济管理的附属活动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系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的关头。历经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和转变之后,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进行社会改造,才能改变政治专制、经济衰弱、文化陈旧的局面。于是,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到民间去”为口号,掀起了一场变革运动。在此情况下,社会调查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当时,西方社会学已传入中国。社会学要扬弃思辨性的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最基础的工作就是社会调查。所以,受西方社会学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也就接受了社会调查的概念体系。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把社会调查作为实证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所谓社会调查就是以系统的科学方法,调查社会的实际情况,用统计方法整理搜集的材料,分析社会现象构成的要素,由此洞悉事实真相,发现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根据调查的结果,研究计划改善社会的方案。再按照社会状况,以适当的展览宣传的手段,唤起民众,使他们认识到关

^① 何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何序》,见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9页。

^② 范伟达、王竞、范冰编著:《中国社会调查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系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而自动地、并督促地方负责者,认真且有效率地实行拟订的方案,解决社会问题。^① 社会调查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基础,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工具。

社会调查派当然并非仅仅局限于农村的调查研究,但在“到民间去”的理念的感召下,他们的调查研究是以向社会底层人群为主,农村的调查研究自然是其重要领域。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陶孟和、李景汉、杨开道、乔启明、言心哲等。其中,贡献最大者当推陶孟和和李景汉。前者是社会调查派的开创者、推动者;后者是此派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最杰出的成就是农村调查。

一、陶孟和:从调查改革社会

陶孟和(1887—1961),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天津。1906年赴日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历史和地理。1910年回国,赴英国求学,在伦敦大学攻读社会学,获科学学士学位。1913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14年回国后,进入北京大学任教。留学伦敦期间,陶孟和师从社会学家威斯特马克(E. A. Westermarck)和霍伯浩斯(L. T. Houbhouse),与后来成为英国社会人类学大师的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是同学。当时,英国社会科学家兼社会活动家韦伯夫妇(Sidney & Beatrice Webb)和作家萧伯纳等创办伦敦经济学院和“费边社”,主张既要研习社会科学,又要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改良。他们对劳工、失业、贫困、老年人等问题开展了很多调查,并从立法上对工时、养老金、工会组织等问题提出建议。韦伯夫人还在1912年建立了“费边调查部”,从事工业管理等问题的调查。他们这种以社会调查推动立法,最终

^① 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据星云堂书店1933年版影印,辑入《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7册,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11页。

实现社会主义的“费边学说”在当时英国社会影响巨大,也对陶孟和产生了重大影响。1912年,陶孟和与同学梁宇皋想编纂一部论述中国社会生活的书《中国的乡村与城镇生活》,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状况。此时,英国已有了一批社会调查的成果,最著名的就是《伦敦人的生活与工作》。陶孟和以为,参考借鉴这些成果,写一部反映中国人生活的书并不难。然而,他很快发现中国这方面的资料基本是空白。中国的史书、志书汗牛充栋,可有关老百姓真实生活的记述少之又少,中国的历史没有一部是描写人民的历史。于是,他立下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在他的提议下,《新青年》开辟了“社会调查”专栏。他在该专栏发表文章,呼吁从调查农民生活开始,大力开展社会调查。

1926年,陶孟和开始了他社会调查的实践。当年2月,陶孟和提出一个社会调查计划,得到美国一个宗教团体的赞同。该团体捐赠3年专款,委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并聘请陶孟和主其事。这个机构一成立,陶孟和即提出三项研究课题:一是“社会调查方法”研究;二是北京工人生活费的调查研究;三是北京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经过三年努力,樊弘完成了《社会调查方法》(1927);陶孟和完成了《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王清彬、林颂河等完成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李景汉完成了《北平郊区之乡村家庭》(1929)。

1929年,陶孟和把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独立机构——社会调查所。社会调查所成立后,广泛开展了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劳动问题、人口问题、统计10类科目的调查研究。

1930年,社会调查所创办《社会科学杂志》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陶孟和都是主编之一。

1934年,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长。调查研究工作仍按原计划进行。

在陶孟和看来,辛亥革命以后,共和制已实行多年,但这个“民国”是